〔读史札记〕

后金都城佛阿拉驳议

阎崇年

《兴京县志》载："旧老城在二道河村南山上，清太祖未建赫图阿拉以前之都城也"①。旧老城，即佛阿拉城。日本稻叶岩吉在《兴京二道河子旧老城》一书的《代序》中，亦称旧老城是清太祖努力哈赤的"第一个都城"②。尔后，踵袭此说，不乏其例。兹就佛阿拉为后金都城之说，略作驳议，以冀教正。

佛阿拉，初称虎拦哈达南冈："上自虎拦哈达南冈，移于祖居苏克苏浒河、加阿河之间赫图阿喇地，筑城居之"③，可作史证。其城所在的阜冈，位置在虎拦哈达东南与赫图哈拉西南之处，因称为南冈。万历三十一年（1603），努力哈赤迁居赫图阿拉之后，始有佛阿拉之称。佛阿拉，满语为Fe ala，汉音译又作费阿拉，汉意译为老城。赫图阿拉兴筑新城，虎拦哈达南冈就成为老城，即佛阿拉。天命六年（1621）三月，后金迁都辽阳。翌年，后金又在辽阳太子河东岸建东京城，天聪八年（1634）四月，尊赫图阿拉城曰兴京；光绪三年（1877），兴京府移治新宾堡，它被称作老城。由是，佛阿拉即老城之称再变——"民间呼为老城"④。它除上述三称之外，早时朝鲜人称之为"奴酋城"⑤，后来日本人又称其为"二道河子城"⑥。由上可见，佛阿拉城，见诸史册，一城五称。

佛阿拉城位置在今辽宁省新宾满族自治县永陵镇南十八里处。它东依鸡鸣山，南傍哈尔撒山，西偎烟筒山（虎拦哈达），北临苏克素浒河即苏子河支流——加哈河与索尔科河，二道河之间三角形河谷平原南缘的平冈上。《清太祖武皇帝实录》载："丁亥年，太祖于首里口、虎拦哈达下东南河二道——一名夹哈，一名首里，夹河中一平山，筑城三层，启建楼台"⑦。丁亥年，即万历十五年（1587）。《清太祖高皇帝实录》所载，与上述文字大致相同。但满文《满州实录》载述文字略异：

Fulahūn ulgiyon aniya, Taidzu Sure Beile, Sali Anggaci hūlan
丁 亥 年 太祖 淑勒 贝勒 硕里 隘口 虎拦

hadai Sun dekdere Julergi giyaha birai juwe siden ala de
哈达 横 稍高 南面 加哈 河 二 间 冈 于

ilarsa hoton sahafi yamun locse tai araha⑧。
三层 城 筑 衙门 楼 台 建

即"丁亥年，太祖淑勒贝勒于虎拦哈达下东南，硕里隘口与加哈河两界中之平冈，筑城三层，兴建衙门和楼台"。这里的记载，同《清太祖实录》相斠，不仅表明"硕里口"为"硕里隘口"，而且增记了"兴建衙门"。此外，《清朝开国方略》将佛阿拉城兴建的时间，系至"丁亥年，春正月"⑨，较前引各书更为具体。

清太祖朝的三种实录，记载佛阿拉城过于繇略，《满文老档》又失之于阙载。康熙《盛京通志》在清代志书中，对佛阿拉城垣与城门的载述最早且最详：

“老城（在治城赫图阿拉）城南八里，周围十一里零六十步，东、南二门，西南、东北二门。城内西有小城，周围二里一百二十步，东、南二门。城内东有堂子，周围一里零九十八步，西一门。城外有套城，自城北起，至城西南至，计九里零九十步，西、西南、北、西北四门”⑩。

但是，清代的康熙、雍正、乾隆《盛京通志》和光绪《兴京厅乡土志》，对佛阿拉城的记述均语焉不详，且康熙《盛京通志》称其“建置之年无考”，可见其纂修者未见《清太祖实录》。然而，朝鲜南部主簿申忠一，于万历二十三年十二月（1596年1月）奉命至“奴酋城”即佛阿拉。他在《申忠一书启及图录》即《建州纪程图记》中，对佛阿拉作了详细的记述。

《建州纪程图记》载：佛阿拉城分为三重：第一重为栅城，以木栅围筑城垣，略呈圆形⑪，似比金太祖阿骨打栽柳禁围的“皇帝寨”⑫更为谨严。栅城内为努尔哈赤行使权力和住居之所。城中有神殿、鼓楼、客厅、楼宇和行廊等建筑，楼宇高二层，上覆鸳鸯瓦，也有的盖草，墙抹石灰，柱椽彩绘。第二重为内城，周围二里余，城墙以木石杂筑，有雉堞、望楼。内城中居民百余户，由努尔哈赤“亲近族类居之”⑬。在城东设有堂子⑭。第三重为外城，周约十里，城垣“先以石筑，上数三尺许，次布椽木，又以石筑，上数三尺，又布椽木，如是而终。高可十余尺，内外皆以粘泥涂之。无雉堞、射台、隔台、壕子。……外城门以木板为之，又无锁钥，门闭后，以木横张”⑮。外城门上设敌楼，盖之以草。外城中居民三百余户，由努尔哈赤诸将及族属居之。外城外居民四百余户，由军人、工匠等居之。佛阿拉城居民总计约近千户。

但是，作为努尔哈赤长达十六年治居之所的佛阿拉城，能否算做后金的第一个都城，需要加以辨正。

其一，京都为天子治居之城。《诗经·大雅》载：“京师之野”，“正义”曰：《春秋》言：京师者，谓天子之所居⑯。《公羊传》又载：“京师者何？天子之居也。京者何？大也。师者何？众也。天子之居，必以众大言之”⑰。尔后，上述诠释渐成公论。蔡邕《独断》载：“天子所都，曰京师”⑱。汉刘熙《释名》又载：“国城曰都。都者，国君所居，人所都会也。”《华严经音义》亦载：“天子治居之城曰都”⑲。以上说明，都城为国家政治神经集注之城，也就是国家政治重心所在之城。虽然佛阿拉如前述已具有城的规模，努尔哈赤又在佛阿拉城治居长达十六年之久，但其时他只是明朝建州卫的一名地方官员，并未登极建元。如他在建佛阿拉城三年后到京朝贡：“建州等卫女直夷人奴儿哈赤等一百八员名，进贡到京，安赏如例”⑳。又如他在佛阿拉接见朝鲜南部主簿申忠一，并请其代达朝鲜国王李昖回帖末署“篆之以建州左卫之印”㉑。可见其时他自诩为明朝辽东建州左卫的一个地方官，而被明视之为“建州黠酋”㉒。再如他在建赫图阿拉城两年之后，给明辽东总兵官李成梁呈文称，“看守朝廷九百五十余里边疆”㉓，仍自视为明朝的地方官员。努力哈赤并未在佛阿拉城告祭天地，自号后金，登极建元，黄衣称朕；佛阿拉城尽管为其治居之所，但不能称做后金的都城。

其二，都城有宗庙先君之主。《左传》载：“凡邑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，无曰邑”㉔。许慎《说文》亦载：“有先君之旧宗庙曰都”。清段玉裁据杜氏《释例》注：“大曰都，小曰邑，虽小而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，尊其所居而大之也”㉕。有的学者认为此指春秋以前：“至于都，春秋以前是指有宗庙先君之木主的城”㉖。但中国古代都城史表明，都城总是同

宗庙与陵寝相联系。《周礼·考工记》云："匠人营国，方九里，旁三门，国中九经九纬，经涂九轨，左祖右社，面朝后市"㉗。"左祖右社"成为后来都城规划与营建的模式。一般地说，除割据政权临时都城之外，中国古代都城与陵庙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。元大都有宗庙而无陵寝则是例外。清初关外的兴京、东京、盛京，皆有陵庙㉘，祭祀其先君之主。然而，佛阿拉却未建陵庙。这为佛阿拉不算清初都城提供了一个佐证。

其三，钦定《清实录》不称佛阿拉城为京都。查《清太祖高皇帝实录》，"都城"凡出现十五次，其中赫图阿拉十二次，辽阳二次，沈阳一次，未有佛阿拉；"京城"凡出现九次，其中东京（辽阳）八次，盛京（沈阳）一次，也未及佛阿拉。《清太祖武皇帝实录》和《满州实录》载述情况与上略同。此外，《清太宗实录》载，天聪八年（1634）四月，尊沈阳城曰盛京，赫图阿拉城曰兴京㉙。在此之前，天命七年（1622）三月，尊辽阳新城曰东京㉚。后金所尊关外"三京"——兴京（赫图阿拉）、东京（辽阳）、盛京（沈阳），没有泽及佛阿拉。这说明清太祖努尔哈赤和清太宗皇太极，并未视佛阿拉为都城；后来顺治、康熙、雍正和乾隆四朝纂修《清太祖实录》和《清太宗实录》时，也未视佛阿拉为都城。因此，佛阿拉在清初——后金时期，不具有都城的地位。

其四，清代官私史籍均不称佛阿拉为都城。清修志书嘉庆《清一统志》不载佛阿拉为京城。康熙《盛京通志》载："志首京城，重建极也。盛京为坛庙宫殿所在，故先于兴京。至东京，虽国初暂建，然圣祖始创之地，旧以京名，不得与郡县城池并列，故附于京城之后"㉛。雍正《盛京通志》完全袭引上述文字㉜。乾隆《盛京通志》纂者谓：

"盛京为坛庙宫殿所在，谨先志之，以明王业之本也。至兴京为发祥之初基，仰见列祖诒谋世德作求之盛。东京国初暂建，然圣祖创业初基，肇域自东，遂奄九有，俱不得与郡县城池并列"㉝。

可见康熙、雍正、乾隆《盛京通志》，均将兴京、东京和盛京列为京城，而将佛阿拉与郡县城并列。尔后，今仅见清修兴京志书《兴京厅乡土志》，也不将佛阿拉列为都城㉞。《兴京县小志》则置佛阿拉城于"古郡城"㉟之列。《清会典》和《清史稿·地理志》均不以佛阿拉为清初都城而加以载述㊱。魏源在《圣武记·开国龙兴记》中，所记都城亦未及佛阿拉。

其五，佛阿拉城不具备都城的规制。《诗经》载公刘都城选址谓："游彼百泉，瞻彼溥原，迺陟南风，乃见于京"㊲。即将临河泉、地广平和高阜冈作为京城选址的三个地理因素。佛阿拉在上述三个因素中，一是水缺乏——"城中泉井仅四五处，而源流不长，故城中之人，伐冰于川，担曳输入，朝夕不绝"㊳；二是地狭窄——三面环山，一面阻河，前无开阔之野，后无辽广腹地；三是冈高峻——在军事上，虽"有利则出攻，无利则入守"，但不宜向四面发展。选址在如上地理因素中的佛阿拉城，规模狭小，房舍简陋，不足千户居民，没有宫殿宗庙。在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各部战争中，佛阿拉既是具有进攻、防御和瞭望功能的建州军事堡垒，又是具有军事、行政和祭祀功能的建州左卫治城。

在探讨佛阿拉是否为后金都城时，应将上列五种因素进行综合研究，而不应捉襟见肘，顾此失彼。按照在中国古代，"都城为天子治居之城"的原则，应把努尔哈赤是否建元称汗，作为判断其治居之城是否为都城的主导因素，并参酌其他综合因素进行分析，作出论断。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城登极建元，"天命元年，众贝勒大臣上尊号曰覆育列国英明皇帝，以兴京为都城"㊴。从此，赫图阿拉正式成为清——后金初期的都城。《长白汇征录》亦载：努尔哈赤迁至"赫图阿拉，遂建都焉"㊵，即是说后金汗努尔哈赤建元称汗以前所治

居之佛阿拉，是建州女真的城堡，建州左卫的治城；并不是清——后金初期的都城。

---

(1)民国《兴京县志》卷十一。
(2)《兴京二道河子旧老城》日本版，页一。
(3)《清太祖高皇帝实录》卷三，癸卯年正月。
(4)光绪《兴京厅乡土志》卷三。
(5)《建州纪程图记》图版五。
(6)《兴京二道河子旧老城》日文版，页十七。
(7)《清太祖武皇帝实录》卷一，丁亥年。
(8)《满州实录》(满文)丁亥年。
(9)《清朝开国方略》卷二。
(10)康熙《盛京通志·京城志》卷一。
(11)《建州纪程图记》图版八。
(12)《历代宅京记》转引，卷二十。
(13)《建州纪程图记》图版十。
(14)光绪《兴京厅乡土志》卷三。
(15)《建州纪程图记》图版九。
(16)《诗经·大雅·生民之什·公刘》。
(17)《公羊传》桓公九年。
(18)蔡邕：《独断》上篇。
(19)慧苑：《新译大方广佛北严经音义》卷下。
(20)《明神宗实录》卷二二二，万历十八年四月庚子。
(21)《李朝宣祖实录》卷七一，二十九年正月丁酉。
(22)《明神宗实录》卷一九四，万历十六年正月己酉。
(23)《东国史略事大文轨》卷四六。
(24)《左传》庄公二十八年。
(25)《说文解字注》篇六下。
(26)杜正胜：《周秦城市的发展与特质》，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五一本，第四分册。
(27)《周礼·考工记》。
(28)雍正《盛京通志·山陵志》卷四。
(29)《清太宗实录》卷十八，天聪八年四月辛酉。
(30)《清太祖高皇帝实录》卷八，天命七年三月己亥。
(31)康熙《盛京通志·京城志》卷一。
(32)雍正《盛京通志·京城志》卷二。
(33)乾隆《盛京通志·京城志》卷十八。
(34)光绪《兴京厅乡土志》卷三。
(35)《兴京县小志》卷十一。
(36)《清史稿·地理志二》卷五五。
(37)《诗经·大雅·生民之什·公刘》。
(38)《建州纪程图记》图版十。
(39)乾隆《盛京通志·京城志》卷十八。
(40)《长白汇征录》卷一。